

戰後台灣文學一甲子 陳昌明

前言

1945年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，至今已過60年。在這60年之間，台灣文學從「皇民化」到戰後「去日本化」，以至追求自己主體價值的過程，發展相當曲折。台灣文學從「有台灣文學嗎？」的質疑，到如今十多所大學院校成立台文系所，每年舉辦數十場有關台灣文學的學術研討會，國家台灣文學館的成立，更開創收集、整理、研究、出版、典藏、展覽的浩大工程。回顧戰後台灣文學一甲子，可以發現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無所不在，亦留下許多難以彌補的傷痕，任何官方立場對文學的掌控與干預，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缺失與後遺症。回顧過去60年，省思歷史的收穫與遺憾，似乎可以說是站在過往的歷史，瞻望未來，希望能夠在全球化迷霧中，尋找我們未來的方向。

二二八事件的長久傷痕

台灣民眾初聞「光復」的消息時，無疑有著歡欣鼓舞的心情，當時的國民政府，是受民眾歡迎與期待，我們從龍瑛宗戰後初期所寫的〈青天白日旗〉、〈從汕頭來的男子〉，都可以看出台灣知識份子對國民政府的善意，而許多日治時期的文人，亦有心投入社會建設，貢獻所學。如1945年吳濁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完成，並任《台灣新生報》記者，楊逵闢「一陽農場」，並成立「新生活促進隊」，楊雲萍任《民報》主筆，張深切回台任教，陳千

武服務台灣同鄉會，楊熾昌任《台灣新生報》記者；1946年龍瑛宗任《中華日報》日文版文藝主編，楊逵任《和平日報》新文學欄編輯，張文環當選台中縣參議員，洪炎秋從北平回台，吳濁流任《民報》記者，都可看出文人作家熱情投入社會的狀況。然而台灣知識份子的熱情，隨政經社會的轉變，時間的推移，他們的期待幾乎全然粉碎。以陳儀為首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，舉措失策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糧食不足，社會混亂，經濟失控，吳濁流小說《波茨坦科長》中，那位會計科科長，趁光復混亂之際接收日產、假公濟私，以貪婪的嘴臉壓榨民眾的行為，正是行政長官公署的縮寫，而呂赫若小說〈冬夜〉，更寫出新統治者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，民眾買不起米糧的悲慘實況。1947年發生的「二二八事件」，雖以取締私煙為導火線，實與戰後一年半期間所累積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問題有難分的關係。



圖1 吳濁流，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。原以《胡志明》為名在日本出版。（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，林民昌攝影）

在文學界，此一事件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，1947年3月起，王白淵被捕，吳新榮遭扣押，楊逵遭扣押，楊熾昌被捕。1948年楊逵撰「和平宣言」被捕，後移送綠島，隔年朱點人被槍斃於台北，次年呂赫若逃至鹿窟失蹤……。經過二二八以後，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們，或死於非命，或流離逃亡，更多人自此封筆，文壇乃由中國大陸來台的文學工作者接手，而日治時期以來的文化體認與創作精神，則化為一股社會的伏流，經白色恐怖的洗練，至60、70年代始漸浮出表層。

二二八事件雖然已遠，然自此台灣人對政治的畏懼，對社會的疏離，對歷史的逃避，甚至族群間的裂痕，皆肇因於此。另一方面，台灣知識份子對於國家認同，主權的探索，自我的定位，亦以二二八事件作為分水嶺，此後數十年，皆籠罩在此事件的陰影之中。

反共文學的匱乏書寫

1949年，由於中國大陸內戰的潰敗，國民政府大舉撤退來台，在中共可能侵台的恐懼陰影下，採取的對策是高舉「反共復國」的旗幟，進行高壓、武裝、宰制式的統治。戒嚴時期的思想檢查、行動監視、祕密監禁與處決，正是造成50年代「白色恐怖」的要素，隨時可聞的「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」的口號，於人人心中建立起一座警總，從此，台灣即陷入中共武力威脅，與國民政府「戡亂」、「戒嚴」政策的雙重夾擊，加上又有許多文人陸續入獄，文壇除了官方引導的方向，其他的立場皆進入沈寂無聲，思想荒蕪的年代。國民黨認為共黨可以贏得中國大陸內戰，與「30年代文學」左傾有相當密切的關

係，故將台灣社會推入新的言論思想管制時期，1949年發布戒嚴令，1950年頒布「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」，正是白色恐怖統治的開始，此後在文學上不但中國大陸左翼作家品受清除，過去台灣30年的新文學傳統，亦被切斷。

「中國文藝協會」與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」是50年代國民政府透過組織與獎金控制文壇手段。「中國文藝協會」是50年代推動反共文學最具影響力的社團，不但成員最多，活動力最強，當時作家多受網羅。此外，國防部總政戰部推動軍中文藝，「中國青年寫作協會」推動校園的戰鬥文藝，影響深入各機關團體。反共文學把文學創作當作思想戰，希望以文藝作品凝聚社會意識，共同對抗共黨，這種以文學為政治工具的立場，以及內容匱乏的寫作方式，使得本有可能產生優秀戰爭文學的可能性消失，除了幾部今日常被提及的小說姜貴的《旋風》、《重陽》，潘人木的《漣漪表妹》、《馬蘭自傳》，王藍的《藍與黑》，張愛玲的《秧歌》，以及陳紀澄的《荻村傳》等，乃至80、90年代部分軍中作家重拾記憶，留下幾篇描述戰爭的動人篇章，大多數反共文學的作品，由於過度刻板公式化，成為揭發共匪惡行的同質寫作，失去動人的文學質性。

中日戰爭以至國共內戰的歷史，如果深刻凝視，好好省思，是可以從時代經歷中，開展出精彩的戰爭文學，國共糾纏的慘痛經驗，亦可以成為近代史傳式的小說，可惜官方主導的反共文學，官僚宣傳意味濃厚，不但在文壇上有宰制性與排他性，大部份作品缺乏時代背景的真实描述，只有虛矯的、片面的醜化描寫與口號

教條，反共文學為人詬病者在此，而此一龐大深厚的戰爭題材，徒留虛幻的含混記憶。

所幸，此一時期的許多軍中作家，後來逐漸脫離反共文藝的巢臼，或抒寫記憶，或反映現實，頗有值得肯定的表現，其中如朱西甯、司馬中原、段彩華、痲弦、洛夫、鄭愁予、張默、管管、辛鬱、商禽、張拓蕪、邵儻、履彊……，都有相當重要的作品。

現代主義風潮的洗禮

50年代中期以後，現代主義（Modernism）逐漸在台灣文壇引領風騷，詩社先後成立，從1954年的「藍星」、「創世紀」創社、1956年詩壇「現代派」的成立，同年《文學雜誌》創辦，1957年《文星》雜誌創刊，至1960年3月《現代文學》雜誌出刊，可以說是戰後現代主義引進的幾個重要指標。現代主義的引進與發展過程中，雖受許多有識之士的批判，但實有其正面的價值。現代主義是西方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一種文學思潮，它包括諸如象徵主義、未來主義、表現主義、

超現實主義、意識流文學，以及存在主義等具體的文學現象和流派，是西方社會進入現代工業社會與資本市場經濟時期的產物，也是20世紀動盪不安的歐美社會，其時代精神與文化思想的反映。也即是說，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和發展，有西方獨特的社會、宗教、歷史與文化的情境和背景，不可能全盤移植到國內的。

現代主義在戰前即曾引進台灣（如楊熾昌的「風車詩社」），戰後引進現代主義的過程，在文類上是有差異的，就現代詩而言，受到的影響主要是意象、象徵、暗喻、對比、張力、吊詭……甚至超現實自動書寫的表現技法，紀弦說現代詩是「橫的移植，而非縱的繼承」，頗受「藍星」等其他詩派的批判，他對現代主義的精神內涵其實瞭解不多，紀弦「存在主義」一詩，只能說是名詞的標籤，連思想內容都未涉及。但是從當時各詩刊翻譯引進的作品，以及國內詩人的創作，其重點主要是在語言情境的錘鍊，意象、暗喻、反諷、密度、有機體……等手法，成為詩歌創作著意之處，有時詩作中亦引入部分作者自己似懂非懂的思想語境，所以此時期的作品，不論圖象詩、象徵詩、超現實詩，皆實驗性濃，初期往往帶給讀者晦澀難解的感受，但繁體字語言特性加上這些表現手法，尤其形式、修辭的方式，使台灣新詩有其精密動人的語言特質，60、70年代以後與台灣寫實手法的新詩人交融匯流，更形成一種獨特的風貌，不但有別於中國五四至30年代的新詩，更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新詩也有很大的差異，台灣現代詩多元的風貌，由日治時期至戰後的眾音呈現，詩人人數眾多，作品質量俱豐，實有足以傲視華文世界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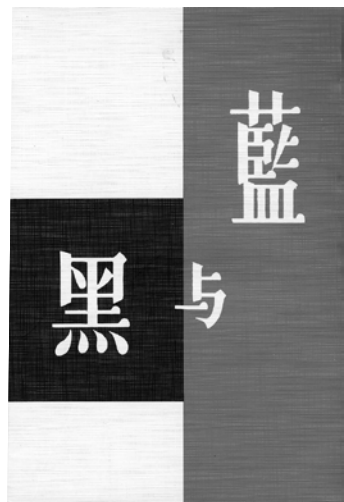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王藍，《藍與黑》。（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）

台灣現代小說從《文學雜誌》到《現代文學》，較有系統的介紹西方小說家，如卡夫卡、喬哀思、沙特、卡繆、湯瑪斯·曼、勞倫斯、吳爾芙、福克納、貝克特……等人的名篇，但是現代主義在台灣現代小說中的影響，當然無法呼應歐洲產生現代主義的情境，當西歐在經歷大戰期間，戰爭的殘酷，人類的自相殘殺，家園與自然的破壞，這些令人恐懼、悲觀、絕望的情景，逼使他們探索自己生存的價值、適應的存在哲學，以及理性的生存方式。存在主義哲學、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與泛性心理學說、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，以至科學態度、理性精神、自由主義的思想，皆曾大量引進台灣，但是台灣現代文學的創作，皆是選擇性的接受，作品中只是局部運用與借境的層面較多，現代派作家在創作上可謂遊走於寫實、意識流、超現實、象徵，甚至涉入佛洛伊德性心理層面等多邊寫作手法，絕大部分作家並未揚棄寫實主義的傳統，所以他們的小說作品，在文學技巧上有較好的自覺，作品的藝術成就相當高，小說家如七等生、白先勇、王文興、王禎和、黃春明、陳映真等，都是明顯的例子，80、90年代以後的小說家如舞鶴、駱以軍等亦不脫此一脈絡，可見西方思潮的引進，可有其正面的價值。

鄉土文學論戰的里程碑

1964年4月，吳濁流創辦《台灣文藝》，成為台灣作家延續新文學傳統的重要支柱，同年6月《笠》詩刊創刊，至此戰後潛伏泥土底層的台灣文學流脈，終於浮上表層。戰前的日文作家如張文環、龍瑛宗、黃得時、王詩琅、王昶雄……在《台灣文藝》中重新潤筆，鍾肇政、施翠

峰、陳火泉、廖清秀、林鍾隆等戰後第一代作家亦發表其圓熟的作品，黃春明、李喬、陳映真、東方白、鄭清文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吳錦發、鍾鐵民、李昂、洪醒夫等戰後第二代小說家也陸續踏開步伐。詩人方面，吳瀛濤、詹冰、陳千武、林亨泰、白萩、錦連、趙天儀、杜國清、李魁賢、葉笛、鄭炯明、李敏勇……也表現他們旺盛的創作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重視本土寫作經驗，貼近土地創作方式的重視，代表台灣作家逐漸克服對血腥整肅的恐懼，以相映應台灣社會的呼吸與脈動，重新展開新的步伐。

這股要求與台灣現實社會貼近的文學流脈，加上70年代外交危機接踵而至，知識份子不斷探問「台灣何去何從」，進而追尋「回歸鄉土」的省思與活動，形成一股時代風潮。然從1976年起，官民營媒體以及軍系報紙雜誌，對此一現象展開一系列的圍剿，成為所謂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其中主要針對王拓、尉天驄等人的論文，以及楊青矗、王拓、陳映真、王禎和、黃春明等人的小說提出批判，將這股回歸土地的風潮，定位為工、農、兵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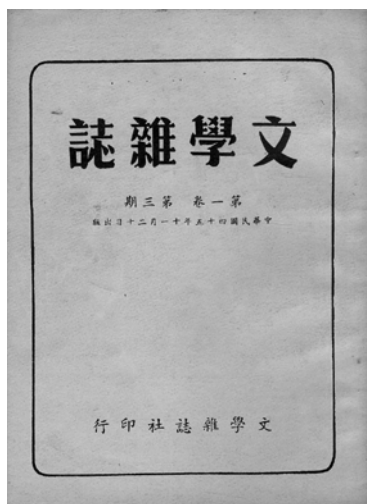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夏濟安主編，《文學雜誌》1卷3期。（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）

學，於是陷入紅帽子滿天飛的情況。這場論戰，主要是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攻擊，實際上早已脫離了文學創作本身，可以說是文學界白色恐怖的尾聲與官方系統最後的反撲，攻擊的一方雖炮火猛烈，但在論戰落幕後，攻擊陣營卻也隱隱然逐漸的體認，真實與在地經驗才是文學必走的道路，這不但宣告官方政治主導文壇的崩解，更開啟80年代後文學多元發展的風潮，寫實主義文學、女性主義文學、都會文學、自然寫作、原住民文學、同志文學、旅遊文學……各種社會現象的描述方興未艾，以至90年代台灣文學正名運動，成立台灣文學系所的要求，追求台灣文學主體性的體認，都由此一論戰作為起跑點，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「里程碑」。雖然「台灣與中國」的糾葛未解，國內統獨立場未能一致，然90年代以後，台灣文學的史觀逐漸被接受，不論省籍背景、統獨色彩，大部分作家都樂於納入「台灣文學」的文學家系譜之中，都可以看出觀念逐漸清晰，以及此一論題的後續效果，它就像一顆種子，在台灣社會萌芽、成長，並逐漸改變許多人的觀念。

結語：多元、融合與全球視野

戰後初期官方的恐怖統治政策，固然帶給台灣文壇重大的痛苦與裂痕，成為幾十年來未能和諧溝通的根源，然隨時代轉變與時間的推移，大家也在調整自己的思維和觀念。90年代之後，政府對台灣文學有較多的善意，似乎也受到本土文學界的歡迎，但是缺乏全面規劃的扶持，也有許多後遺症，例如數年內成立十多所台灣文學系所，外表上令台文界歡欣鼓舞，然因為短期內急速的促成，這些系所師資缺乏、資源不足，甚至空間都捉襟見肘，其

中部分系所聘任師資可謂濫竽充數，更對台灣文學相關系所的學生造成長遠的傷害。又如國家台灣文學館的成立，雖然立意良善，成效卓著，然成立過程、組織形態一變再變，至今政府組織法仍未通過，竟然淪為一個籌備處的黑單位，實令人憂心。而命名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，雖是因行政法人化而定，但遠不如「國家文學館」或「國立台灣文學館」適當，都看出行政缺乏長遠、整體規劃的弊端。

然而行政的缺失，影響層面反而較小，文學社會的衝突，才是令人憂心之事，族群的分野，尤其是政治立場統獨的差異，造成彼此猜忌，將不同立場的人妖魔化，甚至在言語、文字上相互含沙射影，這才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。文學藝術的全球化與本土化本可並行不悖，如果能夠基於族群的融合，不同立場的創作者彼此尊重，建立具有共同意志的台灣共同體，也許可以找出一條台灣文化的出路。也就是我們需要冷靜思索文學發展的土壤是什麼？不要只是急於彼此批判，反而讓台灣文學匯合眾聲的可能性消失，而能誠懇的站在文學審美的立場，不必跟著政治的魔笛起舞；如此我們回顧60年的發展，檢視其中蓬勃的生機與困境，我們應藉著過去發展的契機，思考如何協助培育自己的文學土壤，彼此包容，進而讓台灣與世界文學能多元對話，共同找出一條寬廣的道路，讓我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尋找到我們獨特的位置。